

美国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

罗伯特·布路姆編

(内部读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美国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

罗伯特·布路姆編

北京編譯社譯

(內 部 读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65年·北京

Robert Blum ed.
CULTURAL AFFAIRS AND
FOREIGN RELATIONS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3

根据美国新泽西州恩格耳伍德克利夫斯城
普伦提斯-霍尔公司1963年版译出

· 内部读物 ·

美国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

〔美〕罗伯特·布路姆编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1.00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4}$ ·字数164,000

1965年12月第一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816

目 录

序	亨利·M·里斯頓	1
引言:人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	罗伯特·布路姆	2
一 美国文化关系的性质与发展	乔治·N·舒斯特	10
起源		10
战时宣传及其成果		14
冷战及其方法		20
国际组织的建立		24
取得的经验		27
一种关于文化关系的理論		30
两个全面性的問題		44
二 艺术和人文学的任务	W·麦克尼耳·劳里 格特魯德·S·胡克	51
文化交流的目的		53
美国文化资源的利用		59
問題和机会		79
結論		95
三 教育、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霍华德·E·威尔逊	101
教育是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102
教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104
人員的交换		106
教育与国家发展		119
和平队		124
国外的美国学校和国际学校		126
国际组织		128
进行研究工作的需要		134

教育工作中的技术发展	136
美国的需要和国际的资源	137
一种实验办法	138
結論	140
四 国际合作与科学的两个方面	罗杰·雷維耳 142
科学的两个方面	142
国际科学合作的种类	147
技术援助方面的合作	153
国际科学合作的办法	159
合作的障碍	160
国际地球物理年	162
探索外层空間的合作	164
探索宇宙空間方面的合作	165
美国联邦政府	168
一些应当解决的問題	174
未来的挑战	175
五 对过去的透視和对未来的展望	菲利普·H·庫姆斯 176
从文化輸入国变成文化輸出国	177
战后的繁殖	181
把全国努力联合起来的尝试	192
肯尼迪政府的早期行动	195
将来行动的指南	198
行动綱領	201
适当努力的幅度	210
行动的战略	213
第二十二次美国人大會最后报告	219

序

本书的几篇論文是为1962年10月18日至21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校园阿登大厅举行的关于“文化事务与对外关系”的第二十二次美国人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国际、区、地方大会的参加者以及一般讀者准备的背景材料。

由罗伯特·布路姆編輯的这几篇論文，对美国在海外的教育、科学和艺术活动同国际关系的处理之間的关系进行了探討。

作为一个非党派性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大会对本书所表示的观点，既不表示贊同，也不采取任何态度。哈曾基金会和丹福思基金会——他們的慷慨支援使大会的这项計劃得以实现——也与从这项計劃中产生的任何建議无关。

美国人大会主席

亨利·M·里斯頓

引言：人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

編者：罗伯特·布路姆^①

国际文化关系的历史是同人和思想的国际交流的历史同样悠久的。但是最近以来，由于国际来往和接触的日益增加和日益复杂，科学的进步和交通的改善，冷战的受到重视，许多新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出现，以及政府活动的大量增加，国际文化关系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际文化关系同早期那种传统的文化关系已很少有相似之处了。

国际文化关系这个题目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而且随时发生的事件也使人们无法为它划出一个清楚的界限。人们理所当然地更加关心区分不大明显的而发展非常迅速的那么一类活动的目的、方法和成就，而不太关心如何对它的性质进行精确的分析。德国的那种传统的演进文化(Kultur)，法国那种拥有优美的文学艺术的文化(culture)以及现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那种无所不包的“文化”(“culture”)，都不能恰当地说明我们所关心的这个题目，因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包括这三方面，但没有一个方面真正合适。

① 罗伯特·布路姆，在最近被任命为外交学会中国政策研究部主任以前，曾担任亚洲基金会主席九年。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理事，1956年至1962年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委员。布路姆博士于1947年至1949年任国防部部长助理，后来参加对欧洲和亚洲援外计划方面的工作，于1950年至1951年担任派赴印度支那的经济援助团团长。1953年，布路姆博士任总统国际情报及有关活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文化关系的力量

一般說来，我們是关心国家之間的思想和文化价值的交流的。这种交流是以很多种方式和在无数次的接触中发生的。我們特別关心的，是更加有效地鼓励并从事这种交流。然而，目前正在各 之間發揮作用的文化影响却具有一种力量，其作用远比按計劃建立的“文化关系”和“文化交流”（在这方面专职人員負有特殊責任）的作用为大。他們所領導的活动，并不是决定最重要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交流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由国家力量推动的政治思想的传播，对于经济开发的刺激，国与国之間在設備和貨物以及在旅行家、商人、士兵和新聞記者方面的交换，所有这些都为国际文化关系提供活力和內容。

即使我們需要从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已经做过的工作和應該做的工作方面来談我們的題目，我們也决不能忽略国际文化交流的全面性和复杂性，也不能单单因为需要縮小我們的注意范围而限制我們自己的理解。根据美国关心国际文化事务的历史背景和当代背景，在本书中，我們的注意力主要将集中于教育、科学以及文学和艺术。尽管我們談到了种种計劃和組織，教育交流和圖書館，會議和艺术展覽，它們却只代表正在国际大家庭中流动着的文化影响中的一小部分。在現在这样一个充滿了社会和政治剧变的时代——傳統被推翻，不同的思想发生冲突，通訊速度快、量大、复杂而且往往发出噪音——情况尤其如此。

美国和西方世界以其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理想以及工业化和大量消費的經濟學說，为这些剧变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人民被喚醒了，雄心被激发起来了，新的国家也由于这些运动而建立了起来，但是这些运动並沒有为那些被消灭了的傳統找到建設

性的代替物。这肯定是我们的一项义务：我们应该尽力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发挥我们的文化影响，而不能满足于听任西方的学说仅仅提供一个进行无法控制的改革的愿望。这基本上是一项文化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社会准则以及我们希望同别人分享这些准则的方式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乔治·N·舒斯特在本书第一篇论文中所说的“国际规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不仅存在于界限比较清楚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方面，而且，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宪章中的一句话来说，也存在于“人们的精神里”。科学知识的传播，国与国的相互依赖，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抱负和所受的挫折的彼此影响都意味着，思想、学术和情报的交流对现代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以“开放的社会”自豪并且热望做进步的先锋、它的理想反映了人类希望的社会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如果拒绝别人的思想并对别人的需要抱吝啬的态度，上述目标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决不能把文化活动单纯地看作是怀着一般的援助别人的目的把外国学生带到美国并把美国的书籍和教授送到外国去的一种媒介。文化活动对我们来说也是更好地理解别人的一种方式，而且，如果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我们还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认清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这就是“双行道”的意义。“双行道”与其说是一条道路，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对这种“双行道”必须加以尊重，而不能只是在口头上推崇一番。

这表明，需要把文化活动看作不仅仅是我们的援外计划或国际情报和宣传活动的一种附属品。这些计划和活动固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把文化活动只看作是表明和扩大美国政治影响的一种工具，那就是对它的一种误解。W·麦克尼耳·劳里和格特鲁德·S·胡克在他们论艺术和人文学的文章中，

強調了尊重文化活動的完整及不損害藝術家本身的活力和需要的重要性。寫“科學的兩個方面”的羅杰·雷維耳，指出了把政治考慮同個人對真理的自由探求調和起來的困難，並且看到了藝術家和科學家在地位上的相似之處。如何給予文化活動以它所需要的鼓勵而不損害藝術家、科學家、學者和批評家的基本自由，乃是对自由社會這一概念本身的一種挑戰。如果為了接受支援而必須在控制權和操縱權方面付出很高的代價，那最好還是不給予支援，因為這恰好會把我們所擁護的那些原則毀掉。

文化活動與國家政策

為了有效地執行我們的國家政策，對有關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為了使我們的政策有效，這種環境也是我們必須加以影響的要素之一。因此，在一種非常、實際的意義上，文化領域不包括可以含棄的虛飾物，它是國家活動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到現在為止，我們的行動並不是經常與我們宣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的言論一致的，而且對於國家政策的這個文化要素的適當重視，也還有待化成實際的行動來表明我們已真正認識到了它的重要性。在政府這一級，只有國會、總統和國務卿能做到這一點，而在國外，如果沒有大使的領導和支持，文化事務官員便很難有所作為。這不僅需要大使對許多種叫做“文化”的活動予以批准，而且還需要把文化方面的考慮積極地納入大使館的日常工作中去。沒有文化方面的考慮，對外政策就不可能是有效的。照克里孟梭的意思說：文化關係的重要性太大了，因而不能交給文化事務官員去掌管。

美國政府的龐大援外計劃和情報計劃，常常由於對有關的文化環境認識不足而且對這些活動的文化和社會後果——姑且不談其政治後果——未予重視而受到損害。結果，它們往往缺

乏效力，或是收到并非当初所计划或预料的效果。具有广泛的影响并在全世界进行活动的美国，有一种特殊的义务去了解它在其中工作的环境和它的行动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态度的影响。

此外，文化活动本身还常常由于被认为很有趣味但缺乏连贯性这种轻蔑的看法，或是由于人们不合理地期望它们能够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而受到损害。批评家们往往想同时用这两种方式对待文化活动。他们一方面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文化活动，一方面又把极沉重的责任赋予它们，以至于使它们能够很容易地在文化活动未能完成这些责任时对之加以轻视。人们常常期待某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美学的、教育的和人文学的性质——取得某些不现实的结果，或是责备这些活动未能取得某些结果，而其所以未能取得结果的责任却在别的地方。这种情况是由于人们常常不能分辨文化活动打算为之服务或能够为之服务的不同目的而造成的。结果便出现了形势的不正确的分析，而这又时常导致对复杂事件的简单处理，或导致由于文化活动不能解决问题或不能阻止不利形势的出现——实际上这是由于别的原因造成的——而互相责难。相反地，由于许多种形式的科学、艺术和学术事业都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此人们担心文化活动会损害他们所坚持的政治态度。

这些误解就是我们生活在一种极浓的政治气氛中所付的代价。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政治性的试探——而且往往是短距离的试探——在差不多一切形式的国际交往中都存在。就这方面来说，文化与科学和其他领域并无不同，它也受到政府的慷慨的奖励，同时也感到政治上的束缚和压力。期待文化活动能够脱离政治考虑——特别是在政府这样深深地卷进这些活动的情况

之下——将是不现实的。但是，我們肯定需要对下列两种作法作出一种明智和必要的区分。一种作法是，短視地和自找失敗地企图进行政治和宣传上的操纵；另一种作法是，把文化活动看作国家政策的一种明白表現和我們国家性质的一种反映而加以鼓励和支持。冷战的压力使我們难于作出这种区分，甚至更难于按照这种区分去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叙述它的政府在文化事务中的作用，是一件微妙而困难的工作。一个民主社会中的事务的多样性，不容許政府控制国家的文化生活。共产党国家在使它的文化传统与它的政治目的协调方面，或是在使它的国际政策和行动与它的国内行动一致方面，都没有这类的困难。教会的传教工作——这是国际文化活动中現有的一种最好的表現方式——也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在美国，教育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分散和高度的多样化，还对政府提出了另外一个問題：如何最有效地发掘国际文化活动所需要的资源——艺术家、教师、科学家和书籍。不过，一般說来，这些资源都不是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的。

这种情况使非政府方面的参与在美国国外文化活动当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非政府方面的参与說明非政府方面給予这个活动多种多样支持的传统，說明政府在这类事务上不能充分为国家說話，說明非政府机构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比政府更加有效。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得在私人的活动和政府的活动之間，在私人的活动和政府的政策之間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諮詢关系，甚至协作关系。同时还出現了这样一个問題：是否需要发展新的机构和技术，这些机构和技术将使目前在美国社会中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资源和考虑——不論是政府的还是私人的——有效地协调起来，以便使它們在国际上最能表达我国的人文标准和政治目的。

这些标准和目的，尽管它們之間的矛盾往往使个别的事例发生困难，我們还需要最終將它們協調起来。本书的几篇文章表明，作者对于文化活动与国家政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认识到了的。然而，他們都明显地或不明显地认为，国际文化关系拥有一种不受当前政治考虑的限制的任务和重要意义。例如，美国同共产党国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共产党国家的国际文化活动同样受到了重視。但是，几个作者都沒有把美国正在做的事情或它應該做的事情仅仅看作是对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的一种反应。美国正在做或應該做的事情固然是一种不容忽視的政治考虑，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我們注意的中心，那就是誤解了国际文化活动的真正的长期重要意义，就是被吸引到一种模仿和反应的政策上去而不采取独立的主动行动，就是賦予文化活动以一种要它立即取得政治效果的不现实的責任。

近些年来，对于援外計劃中一个重要部分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在世界新发展地区进行的文化活动，給予了新的动力。訓練外国学生和建立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大学，已经成了帮助新国家发展并把我們的一些文化标准帶給它們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新发展可以在殖民主义时代找到先例，特别是霍华德·E·威尔逊在他的論教育的文章中談到這個問題，他认为在教育这个領域內一直存在着大量的物資和顧問形式的援助。但是，不能因为热心于这些活动而模糊了下面的观点：国际文化关系是人的种种願望在人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上的表現。也不能因为強調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而錯誤地只用援助者和被援助者的眼光来看待文化关系，并且忽視我們必須“受”和“学”以及“給”和“教”的道理。

W·麦克尼耳·劳里和格特魯德·S·胡克极力主张，我們不要因为在亚洲和非洲新发现的利益而牺牲我們同欧洲的文

化联系。作为欧洲文化的受益者，我們这样做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是对我們自己历史的歪曲。此外，正是在同欧洲——我們从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的关系上，我們能够最好地衡量我們自己的文化成就和考察我們的文化在外国所享受的声誉。我們的国际文化活动是受我們国内文化生活的性质和质量的影响的。我們不能在醉心于喜剧书籍和惊险电视影片的同时餓死我們的歌剧，也不能期望利用某种魔术就可以使美国的“形象”看起来不是它实际的样子。国外的形象反映了国内的实质。

未来的任务

本书的几篇文章表明，我們已经进行过的活动种类多得惊人，而且还指出，有很多种任务将考验我們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考验我們自己的教育、科学及艺术生活的深度和质量。实际上我們正面临着一种新的国际挑战，这种挑战無論从多么狹隘的意义上說也不是政治性的，但它却要求我們到思想、才能和理想的市場上去进行竞争。这些思想、才能和理想必然都是我們自己社会的一种反映，但其中應該包括一些可以告訴別人的重要东西。此外，在向別人介紹我們自己时，我們不能只注意一小批受过教育的領袖人物，而且还要看到大多数的人民，我們需要同他們建立有效的联系，以便使我們能了解他們的願望，也使他們感到我們可以給他們一些有益的东西。因此，严格地說，本书所涉及的問題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美国在保持領導地位方面的能力。正如菲利普·H·庫姆斯在本书的最末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我們所面临的任務要求政府作出最大的努力（到現在为止政府還沒作出这种努力），也需要那些非政府組織参加这项工作并發揮它們的活力（它們使我們的社會富于多样性和活力）。

美国文化关系的性质与发展

乔治·N·舒斯特^①

现代意义的文化关系，具有简短而动人的历史。欧洲主要的殖民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们对附属国人民的社会责任和它们对当地文官和统治阶级的依赖的必要，而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开始日益把文化影响作为一种合作的工具。这种作法后来便成为对待其他国家的政策的基础。它们发展了很大的服务网，目的是为各级的教育服务，但往往特别着重于艺术。这种服务网的成就常常是很突出的。今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成就同那些一度为人支配、影响而如今业已独立的民族的文化已经溶合到什么程度。

起 源

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对拉丁美洲开始推行那种通称“睦邻政策”的时候，正是上述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事实上也是一种典范作用。诚然，在国务院1938年7月2日根据贯彻“睦邻政策”的命令设立文化关系司以前，美国在文化

^① 亨特尔学院名誉院长乔治·N·舒斯特(George N. Shuster)，现任美国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代表，并且是圣母院大学校长助理。他曾任国际教育学会主席和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总諮詢委员会委员。舒斯特博士写过很多关于教育问题的书，最新的一本为《我走过的路》。

交流方面也进行过一些活动。这种活动大部分是由于私人的倡議而进行的，虽然联邦政府也曾经适度地参預。国会曾授权史密逊学会制訂关于輸出文学和科学資料的条例。根据同中国政府达成的協議，由于义和团叛乱而付給美国的賠款被保存了起来，备作援助中国的留学生之用。有时，大使和領事实上也成了文化使节。

但是，就美国在文化关系方面的官方政策而論，1938年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我們可以看到，从那时以后，这项官方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可分作下列几个阶段：

第一，筹建文化关系司。

第二，在战争期間和战后把文化活动和宣传結合起来。

第三，美国进入国际合作的領域，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組織于1945年和1946年的成立就是个标志。

第四，随后为保证相互友好的气氛和提高活动的质量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我們將簡要地回顾一下这几个阶段（可惜缺少能够比較詳細地概述这几个阶段的材料），以便分辨出其中的主要問題，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些基础。

文化关系司

文化关系司的工作，从很多方面來說都是一項新的事业。国务院的人員和一个总諮詢委员会曾合并到一起，以便代表美国执行1937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簽訂的美洲各国文化活动促进大会的各項条例。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很保守的計劃。它主要是关于人員交換的，而交換的規模現在看来似乎很小。但是，这种交換对后来的所有文化关系計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却是值得注意的。随着時間的推移，随着欧洲和远东的战争給人类

世界投下悲慘的阴影，中国、非洲和近东也成了文化关系司所关心的对象。后来，該司还考虑了如何帮助德国教育事业摆脱納粹主义羈絆的問題，并且会同流亡的教育部长會議拟訂了关于未来的計劃。但是，沒有等到这种思想大部分付諸实现，国务院就把它所有的“鸡蛋”都放进战时情报局这个宣传“孵卵器”了。

在好几个方面，文化关系司都树立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至今仍然是我們的主要想法。首先，它对人員交換的強調至今沒有改变，尽管这项工作所牽涉的人已经大大增加。实际上，誰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有多少人在从事这项活动，因为除了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交換計劃以外，还有陸軍、全国科学基金会、中央情报局以及政府其他部門的交換計劃。

第二，文化关系司曾在多次長時間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辯論中，就文化关系方面的努力是否應該沒有自身的目的或是否應該公开地(或有时隱蔽地)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問題，进行过彻底的討論。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純粹依賴互相交流文化成就和經驗的計劃，在战争期間和冷战的年代里已开始显得不切实际。但是，我們在后面将看到，对下面这种想法的支持最近有了显著的增加，那就是，應該有一个主管文化活动的机构，它的活动与国家的政治利益沒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当文化关系司1941年設置文化关系官(后来改名为“文化專員”)这项职位时，它要求这类官員具备的条件如下：

……他們应当具有适当的性格，以保证他們能够發揮自己的能力，在駐在国的人民中有效地进行工作；他們应当有广泛的文化兴趣，对那些他們也許並沒有專門知识的事物应当能够了解和欣賞；他們应当具有积极的想像力和热情；他們的观点应当是一个成熟的、有教养的人